

以问题为导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戴锦

(大连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8)

摘要: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总结提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为中心任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研究课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为指导,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进行准确深入的理论提炼,通过深入研究这些重大经济理论问题,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要面临三大经济理论问题:一是如何分析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二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辩证关系,三是如何科学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与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之间的辩证关系;需要在系统分析上述三大理论问题过程中,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三大理论分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制度优势

中图分类号:F0-0;G63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1)04-0026-11

Problem-oriented theoretical system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AI J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Jiaotong University, Dalian 116028,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Build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significant research project in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收稿日期:2021-03-20

作者简介:戴锦(1968-),男,安徽天长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takes "summarizing and refining the great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s its main task. This paper conducts accurate and in-depth summaries on the major economic theoretical issues in China's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dopts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s the guide, and aims to summarize the basic rules in building a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are three main economic theoretical issues in building a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first is how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econd is how to recogniz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ism and market economy. The third is how to scientifically recognize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dher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drawing on the beneficial elements of western economics. In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above three theoretical issues, three theoretical branches will be formed, namely socialist development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is basi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ll be constructed further.

Key words: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socialist development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theory;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institutional advantage

2016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1]上述论断实际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学术使命,即总结和提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那么如何总结和提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呢?需要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进行准确深入的理论提炼,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为指导,通过深入研究这些重大经济理论问题,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是一条以问题为导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路线,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研究综述

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项重要理论课题,国内理论界对此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探讨,目前大致形成了以下几类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类观点大体可称为“继承派”。持此类观点的学者比较强调应当从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框架角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如赵锦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应与《资本论》的分析框架相协调^[2]。逢锦聚认为,应该按马克思6个分册的内容来安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3]。

第二类观点大体可称为“归纳派”。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倾向从归纳概括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各

种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和发展方式角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如张宇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对外开放4个部分^[4]。胡迺武等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基本框架包括10个方面: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理论、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全方位对外开放理论^[5]。

第三类观点大体可称为“发展派”。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倾向从经济发展角度特别是发展生产力角度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如黄泰岩基于发展的逻辑主线,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框架确定为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目的、发展速度、发展转型、发展动力、发展道路、发展资源、发展环境、发展制度十大方面^[6]。洪银兴认为,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体包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生产力3个层次^[7]。乔榛认为,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经济学”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建设性经济学”,应该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规律和机制为对象,主要包括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理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理论四大研究主题,其核心是生产力发展理论^[8]。

第四类观点可称为“国际派”。此类观点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已经成为具有国际经济学界通用的范式,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也需要采取这种“国际通用范式”。如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学家提出来的理论要有国际的影响,除了语言的问题外,研究方法和表述的方式需要采用现代国际经济学界通用的范式才可……如果是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和范式,其他国家的经济学者没有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不能沟通交流也就难有

国际的影响”^[9]。洪永森认为“我国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者必须遵循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规范”,即“数学模型和计量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与国际经济学界交流、沟通并被接受”^[10]。

上述几类观点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问题,从不同侧面对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但是都没有把“提炼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因而在研究路线上都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

第一,“继承派”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体系上的连续性、继承性,这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方向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种研究思路容易纠结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的不同文本解读上,如一些学者基于对《资本论》考据式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究竟是研究“生产关系”“生产力”还是研究“生产方式”争论不休。笔者认为,这类概念性的研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注意力集中于此类概念辨析,就容易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搞成一种从概念到概念、脱离现实的“书斋里的政治经济学”。

第二,“归纳派”力图基于某种理论叙述架构,如“制度—运行—发展—运行”“制度—结构—政府—增长”“微观—中观—宏观”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进行理论归纳和总结^[11],对于整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是,“归纳派”的总结基本上是一种“经验式总结”而非“理论总结”。“经验式总结”与“理论总结”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是看到了规律发生作用的形式,只是通过某种形式上的“框架”或“主线”将若干理论拼合成一个体系,而没有揭示同一体系的不同理论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①,而后者则力图揭示规律发

① 如在经济学史上,萨缪尔森将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以所谓“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框架拼在一起,建立起所谓“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但是这个体系中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仍是两个各自独立、无先后逻辑之分的理论。

生作用前提条件和内在机制。“归纳派”的研究容易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搞成某种形式的政策汇编或政策解读。

第三,“发展派”强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课题,抓住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改革开放的主线,突破了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只重视生产关系的局限。但政治经济学不等同于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问题也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唯一研究主题。除了经济发展问题之外,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发展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的概括有失偏颇。

第四,“国际派”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应当适应现代经济学发展趋势的问题,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现代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视为完美无缺、必须遵循的“国际通用范式”是否合适,有待商榷。实际上,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在研究方法似乎很“科学”、很“严谨”,但是这种“科学”和“严谨”是建立在对经济现实的过度简化甚至歪曲的前提假设基础上的,如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政府作用的假设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政府职能理论上,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职能的实际情况。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分析框架并不完全适合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12]恩格斯的上述观点实际上意味着,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不是类似“边际效用递减”那种与历史条件、国家具体情况无关的“纯粹经济问题”,而是在不同历史条件,基于不同国家现实状况产生的“现实经济问题”,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源于现实的社会经济实践,而不是书斋里的理论演绎。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倡导研

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源于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提出的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长期思考,由于这些问题既无法完全照搬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阐释,也不能完全照搬现代西方经济学来分析,因此需要构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以分析解决各种“中国特色”重大经济问题为己任的“问题导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抽象的概念体系,对改革开放以来各种重大方针政策进行归纳罗列或者用西方经济学语言“讲好中国故事”都不是这种“问题导向”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风格。相反,科学地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亟待分析和解决的各种核心理论问题才是“问题导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任务。

那么哪些问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亟待分析和解决的核心理论问题呢?通过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学理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笔者发现,在长期治国理政实践中,围绕“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比较关注三大经济学理论问题:一是如何分析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二是如何阐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辩证关系,三是如何科学认识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与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三大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通过分析和阐释上述三大问题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二、如何分析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

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奇迹”不仅奇在中国经济几十年持续高速增长,更奇在中国逐步形成一种既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又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经济发展模式,即所

谓“中国模式”。对于“中国模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无法给予合理的阐释。

如何分析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01年就提出,由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揭示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本质和基本趋势的科学,“不能用来直接回答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具体的新问题”;西方经济学又主要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难以有效地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具体社会实践”,因此需要在学习借鉴西方发展经济学基础上,“结合实践探索和建立一门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学”^[13]。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立一门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构想表明他当时已经意识到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因此需要进行理论创新,构建一种用于分析阐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学”,这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萌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精准扶贫”“一带一路”“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等一系列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观和发展战略,为进一步总结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奠定了基础。

经济发展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并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西方发展经济学范式三大基本研究范式^[14]。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建立在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历史以及伦理道德等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综合分析方法,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思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兴起的西方发展经济学以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为理想参照系,研究战后一大批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政治独立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问题。但是,西方发展经济学总的来说并不十分成功,甚至不少发展经济学家一度都认为西方发展经济学已经“失败”^[15]。西方发展经济学之所以不十分成功,原因很多,至少有两点理论教训值得我们吸取:一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常常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政策,正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所言“现在对欠发达国家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经常是出于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的一时的和狭隘的政治利益或战略利益……各种各样的研究现在都按照这些研究对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安全’做出的贡献来进行评判”^[16]。发展观的错位使得西方发展经济学提出的各种政策主张不可能真正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利益。二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基本是依据基于发达国家的国情和发展经验提炼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并且试图得出超越不同国家具体国情的一般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实践证明,并不存在适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某些国家比较成功的发展经验硬搬到其他国家,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吸取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教训,我们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就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而应该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出发,立足中国国情,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

第一,在发展理念上,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发展经济学是一种具有一定意识形态色彩的经济学^①,突出表现在任何一种发展经济学

① 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率先使用“发展经济学”一词来表述他们基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所以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学”被局限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笔者认为,对发展经济学的这种限定是不合适的,是西方经济学界长期控制经济学学术话语权的一个表现。有鉴于此,在本文中,对于发展经济学采取一个更为广义的定义,即将所有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经济学理论都囊括在发展经济学中。这样,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及正在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都属于发展经济学范畴。而原来那种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则被称为西方发展经济学。

理论都是在某种发展观的引领下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都是服务于某一利益集团或某一国家的根本利益的。区别于西方经济学的“财富增长观”,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就要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进一步中国化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目标。简而言之,就是“富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所谓“富强”就是“民富国强”。“民富”是指“共同富裕”,这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国强”则是指“建设现代化强国”,这是中国作为大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基本发展要求。西方发展经济学通常将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即“富裕”作为经济发展目标,这是不够全面的。“富裕”对于某些小国来说可以是经济发展的唯一目标,但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则是不合适的。在今天的世界上,有不少“富而不强”的国家。这些国家人均收入很高,甚至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标准,但或是经济结构单一脆弱,经不起世界经济的风吹草动;或是国土面积狭小,无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或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缺乏核心技术,必须仰仗其他国家的赐予。正是由于“富而不强”,这些国家虽然很富有,但在经济、金融、科技、政治、外交、国防甚至文化上不得不依附于其他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也不得不常常接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经济、金融、政治和安全领域上的剥削、压榨和控制。

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既要实现“富裕”又要实现“强大”,具体来说:(1)到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携手消除贫困,实现共享发展;(2)建设绿水青山的生态型国家,实现绿色发展;(3)建立关键领域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创新体系,实现创新发展;(4)大力消除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实现协调发展;(5)在对外开放方面,要从国际经济秩序的参与者转变为国际经济新规则的重要制定者,实现以我为主的开放发展;(6)进一步优化

独立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发挥国内市场潜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自主发展。

第二,在研究假设上,要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提炼研究假设。科斯在其名篇《企业的性质》中第一句话就指出了经济学研究存在的一种错误:“过去,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在建立一种理论时,经济学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17]今天,个别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问题时仍然陷入科斯所说的“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的错误,即不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构建前提假设,提出理论模型,而是从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出发构建前提假设和理论模型,再依此分析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因而产生“东施效颦”和“削足适履”的错误。例如新结构经济学从亚洲四小龙“成功经验”出发提炼的研究假设^[18],受不考虑政治因素、只讲“经济效率”的新古典经济学影响较大,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对中国特殊国情的分析,需要考虑到现实的经济发展是受到政治因素强烈影响的”^[19]。

那么,中国的具体国情是什么呢?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就是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一是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独特文化和制度传统、国内地区差异较大、国内市场巨大的“大国”。这使得中国不同于那些在价值观和制度架构上已完全“西化”,或者国内区域差别不大、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小国。二是中国是一个内政外交上“独立自主的国家”,这使得中国不同于那些在政治、外交、安全上依附于某些大国的国家。三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西方个别发达国家因此经常对中国进行非理性经济歧视、封锁或制裁。四是中国在某些方面如人均收入还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但是经济、科技、军事的总体实力已经超过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将长期面临“后发大国”与“守成大国”在各个领域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冲突构成中国经

济发展复杂而严峻的外部国际环境。上述几点基本国情是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充分重视的基本前提条件。

总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其独特性,它既不同于前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不同于“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也不同于亚非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源于前苏联经济发展经验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源于英美经济发展模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源于“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经验的新结构经济学、源于研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西方发展经济学都不适合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以“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为己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上,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立足于中国国情提出研究假设,总结提炼中国发展经验,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

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辩证联系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研究的第二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相互结合以及如何相互结合?

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相互结合问题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01年通过学习研究《资本论》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和深刻的理论观点。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资本论》主要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因此“如果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原理和规律难以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经

济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20]。这一论断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探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的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认为,马克思关于计划经济的一些设想在马克思那里“仅仅是一种设想,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实际上是后人将自己的思想和认识硬加到了马克思的头上……因而也就不可能去有效地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20]。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论述突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主义等于计划经济的思想教条,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富有重要启迪意义。由于十月革命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并把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确立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因此在很长时期内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将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并试图通过批评计划经济的缺陷来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有效性。例如,熊彼特就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不是由私人占有和经营企业,而是由国家当局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以及谁该得到什么的那种社会组织^[21]。米塞斯等也认为,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价格制度,就不能进行经济计算;经济计算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必然导致社会主义中央计划体制失灵乃至瓦解。因此“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22]。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论述指出,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出过一个成熟的计划经济理论,他只是对未来社会的经济计划性有过一些没有经过严格论证、不十分成熟的设想。如果把这些不够成熟的设想视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系统和严谨的理论,并用于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实践,那么必然导致人们对社会主义先验、片面、教条式的理解,并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失误和挫折。总之,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不可行性也不等于社会主义的不可行性。

第三,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探讨了马克思跨越

“卡夫丁峡谷”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落后国家在社会制度上能够越过“卡夫丁峡谷”,但不能逾越商品经济发展的“卡夫丁峡谷”。既然在社会主义阶段离不开商品经济,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必然是相容的^[20]。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商品经济的“卡夫丁峡谷”不可逾越的思想来论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性,是对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规律的创造性运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但是以往人们在运用这条规律时主要考虑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发展时产生的阻碍作用,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如果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即如果人为跨越生产力发展的“卡夫丁峡谷”,也会对生产力发展产生破坏作用。因此生产关系无论滞后还是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都是对生产力发展状况的不适应,都需要进行调整和变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先进,如果不考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而片面“拔高”生产关系,也会对生产力发展造成巨大破坏。以此观之,所谓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容性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能否通过改革调整生产关系使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而检验这种相容性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相容的,但是如何在理论上更加系统地论证这种相容性的内在逻辑,则是历史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学术使命。

除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结合的相容性问题之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还需要分析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促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对于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唯物辩证法创新性地提出了“两个组合”的重要论述,即要将“能够集中财力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优势以及“党的领导、群众路线、思想政治工作”等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与市场经济“优化资源

配置”的突出优势结合起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优势组合”,同时要避免形成计划经济体制劣势与市场经济劣势的“劣势组合”^[23]。习近平总书记上述“两个组合”的重要论述对于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关系,促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回顾四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可以发现,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同时,避免经济大起大落,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关键一条就是从实际出发,将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优势、政治优势以及意识形态工作优势与市场经济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因此,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辩证关系,促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就必须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各自有哪些优势,这些优势各自发挥作用的条件和机制是什么,如何使社会主义的优势与市场经济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构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优势组合”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总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否相容、如何相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课题。但实事求是地讲,迄今为止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容性问题的理论解释还不是十分完善,其原因在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性问题异常复杂。要阐释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价值观等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另一方面还需要对什么是市场经济进行“再认识”^①。在此基础上,还要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机制问题,如公有制实现形式、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进行系统的理

① 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简单理解为竞争性价格机制,并视其为效率最高的资源配置机制。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科斯指出,市场(价格机制)与企业(计划或命令机制)都是资源配置方式,二者无绝对的优劣之分。威廉姆森将市场视为交易的一种治理结构,除了市场以外,还有其他一系列交易治理结构如第三方治理、双方治理和一体化治理等等。总之,市场经济远比价格机制复杂得多,并且市场经济本身运行机制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中。

论阐释。对于这些理论问题,无论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没有给出一个成熟的答案。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土壤和经验材料。可以判断,全面阐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性问题不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任务,也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世界经济经济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理论贡献。

四、如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心任务是“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是通过总结提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两大重要内容,而“如何”总结提炼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三个研究主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问题。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问题,在2016年7月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有过比较系统的阐述,他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观点实际上提出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几个基本要求。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对于如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为指导,另一种是以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主张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干,兼收并蓄地吸收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成果。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呢?关键是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运用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的辩证思维,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产生的经济问题。

西方主流经济学比较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性、实证性,但忽视经济分析的历史性。例如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价格、市场、企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等,这些经济现象都被假定天然就存在,而且在不同国家都采取同样的表现形式或作用机制,也似乎与不同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无关。这种“假定其他条件无关或不变”的研究方式适合建立比较抽象的数学模型,也能够揭示出一些抽象的经济规律,但不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当代中国现实的经济问题。而当代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都不是单纯的只讲“经济效率”的“纯粹”经济学问题,而是与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基本经济制度、政治、法律、文化以及外部国际环境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经济问题,简言之,是政治经济学问题。例如,对于近年来日趋激烈的中美贸易摩擦,如果单从平衡贸易逆差等经济角度来分析,就很难解释美国为什么放弃“互利双赢”的双边贸易,发起“两败俱伤”的贸易摩擦;但是如果联系到美国视中国为竞争对手,试图以贸易摩擦为手段遏制中国发展,那么就不难理解中美贸易摩擦的“政治经济学”,甚至可以断言即使有一天贸易逆差消失了,中美贸易摩擦还会以其他形式继续进行。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必须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分析各种“中国特色”的经济问题。通俗地说,就是不能单纯就经济论经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一定要“讲政治”。

第二,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如何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是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目前主要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教条主义倾向,个别学者局限于以经典语录中的单词独句为依据评论西方经济学,而不是以事实为依据,显得空洞而缺乏说服力。二是形式主义倾向,个别学者盲目使用计量分析和数理模型,不顾相关假设是否符合中国现实,形式主义地利用数据和模型,就会产生“用谁也不知道的模型推论出一个谁都知道的结论”,对中国经济学研究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要克服上述两种倾向,关键是立足中国国情提出研究假设。例如,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实施长期发展规划对经济发展产生更为持续、广泛和深入的影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就必须从这一中国国情出发,提炼出中国特色的“政府假设”,以此构建理论,而不是试图将中国特色的“政府角色”假设为西方经济学中的“政府”,削足适履地适应西方经济学理论。

五、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遵循“先提炼和研究问题,后构建概念和体系”问题导向的研究路线,而不是“先构建体系,再研究问题”概念导向的研究路线。具体来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两大问题,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两大理论,前者可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后者可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均衡理论”。在两大理论研究中,逐步形成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又吸收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的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当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逐步成熟后,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就水到渠成了。

纵观经济学发展史,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规律,即每当一个大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时,就会出现以总结该国经济发展经验,反映该国经济利益诉求为主旨的经济学理论。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的自由贸易理论之于十八九世纪的英国,李斯特主张保护国内幼稚工业的“国民经济学”之于19世纪的德国,萨缪尔森等人的新古典综合派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以此观之,以“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为己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显然是中国和平崛起在经济学领域的反映。但是与以往西方列强习惯于将自己的经济理念、经济发展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现的是中国长期倡导的各国结合本国国情确立发展道路的基本理念,体现的是不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的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优秀思想。当然,也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影响力的不断提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总结将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重要的借鉴作用,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深入探讨将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产生革命性的冲击,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性发展,也将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摆脱被“边缘化”的局面,走向“主流”,在新时代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习近平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N]. 人民日报, 2016-07-09(1).
- [2] 赵锦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研究[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4): 13-18.
- [3] 逢锦聚. 马克思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的原理及

- 其在经济新常态下的现实意义[J]. 经济学家,2016(2):5-15.
- [4] 张宇. 努力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2):3-12.
- [5] 胡迺武,田子方. 略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J]. 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1):35-42.
- [6] 黄泰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线和框架[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5):8-14.
- [7] 洪银兴. 构建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J]. 经济学家,2016(3):7-9.
- [8] 乔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构想[J]. 学习与探索,2017(2):98-105.
- [9] 林毅夫. 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与创新的思考[J]. 经济研究,2017(5):6-10.
- [10] 洪永淼.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用国际语言讲述中国故事[J]. 经济研究,2017(5):19-21.
- [11] 周绍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进展、争鸣与共识[J]. 江西社会科学,2020(6):51-59.
-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13] 习近平. 发展经济学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兼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借鉴[J]. 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1(9):4-9.
- [14] 于金富. 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范式及其历史演进[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5-11.
- [15] 方福前. 论发展经济学失败的原因[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4):53-57.
- [16] 冈纳·缪尔达尔. 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M]. 方福前,译.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 [17] 奥利弗·E. 威廉姆森,西德尼·G. 温特. 企业的性质——起源、演变和发展[M]. 姚海鑫,邢源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18] 林毅夫,李志赟.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J]. 经济研究,2004(2):17-27.
- [19] 余永定. 发展经济学的重构——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J]. 经济学(季刊),2013,12(3):1075-1078.
- [20] 习近平. 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J]. 东南学术,2001(4):26-38.
- [21] 约瑟夫·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 吴良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22] 路·冯·米塞斯,陈国雄.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6(6):59-63.
- [23] 习近平.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辩证关系[J]. 内部文稿,1998(11):1-5.

(责任编辑:杨南熙)